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 晋城市泽州县卷（上）

主编 王丽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晋城市泽州县卷（上）

主编

王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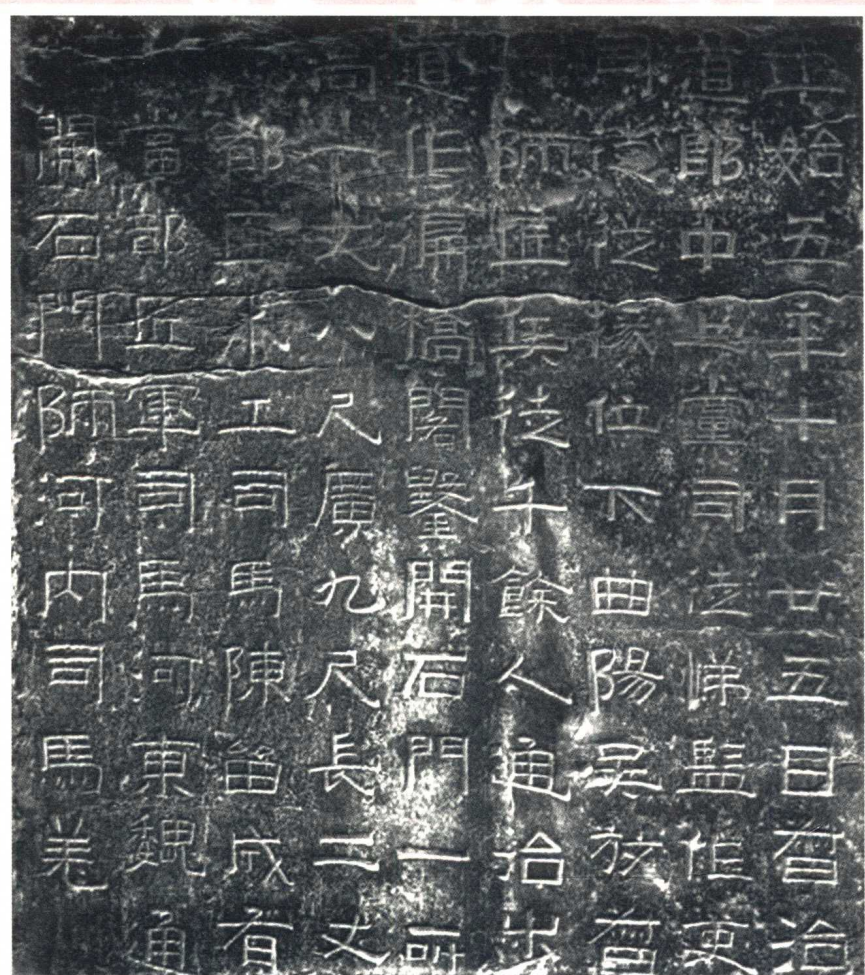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封扉题签：姚奠中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问：薛延忠 金道铭 申维辰 申联彬 李小鹏 高建民
胡苏平 张 平 李立功 胡富国 白清才 郭裕怀
杨安和 李学勤 姚奠中 张正明 令政策 李潭生
刘 江 张 领

主任：刘泽民
常务主任：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泽俊
刘纬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 杨子荣 邢利斌
梁俊明 张玉洁 崔正森 贾玉瑞 翁小绵 陈 明
齐荣晋 于贵卿 宋新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张鸿仁 吴广隆
李 尧 李 非 李小强 刘合心 高 可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 霍润德

总主编：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文 琴 张继红 落馥香

审 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编纂委员会

顾问：张茂才 王清宪 康吉仁 任建宏 王克平

主任：吴广隆

副主任：冯裕民 郭治琛 秦海轩 刘金锋 张广善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甫平 冯俊儒 杨秉聿 商浩辉 秦雪刚

办公室主任：杨秉聿

主编：吴广隆
副主任：秦海轩 张广善
点校：马甫平
编辑：杨秉聿
摄影：冯俊儒
资料整理：关 静 阎艳阳 秦江波 张旭平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编委会

主任：崔守安 常广智 副主任：王 丽

主编：王 丽 副主编：田新林

点校：李文红 杨天幸 程耀中 王国瑞 张建军 秦喜明

编辑：钱 瑜 郭 宇 张宇超 程 晨 樊周婧

摄影：程五一 马剑峰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以《三晋石刻总目》为基础，凡古代、近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社会文化价值的私人墓碑等除外）。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铭和墓志，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录文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件石刻编纂内容包括“名称”（全称）、“简介”、录文（全文）。另附照片或拓片。

七、凡属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简介”中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八、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九、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627）。括号内公元年号前后不加“公元”和“年”字。1912年以后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1949年10月1日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一、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以“厘米”为单位。如长（或高）120、宽60、厚80厘米，长、宽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

十二、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1957年汉字简化之后，有的碑繁简混用，录文尽量保持原貌，以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录文横排，原则上根据文意分段，不易分段的，可以连排。编者所加文字，用楷体字，并加圆括号，以与正文宋体字区别。如“（碑阳）”、“（碑阴）”等。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及不当之处等，保持原貌，不作甄别、注释和括注。

十四、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下阙”表示。

十五、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阅读，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棺木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轭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头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寿,常常以龟(实际称赑屃)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卣》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宠、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

的原因(如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各类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石刻最多时究竟有多少,谁也不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以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团体,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只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摭,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具有不能再生性的特点,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佛,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山西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吴广隆

把人类社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活动和理想信念记载下来,永久地留给后世,应该说伴生于人类系统思维的形成,很久以前就成为人类的一种追求,于是才有了岩画、刻画纹、陶器上的符号、原始的文字以及后来的金文、刻石等多种形式的历史记录,而石刻就是其中形式最为成熟、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

“托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这是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对碑刻及其功能的形象描述。

碑刻记事的形式最初形成于西汉,之后便广为流传,一直为后人所应用,直至今日仍然发挥着证史、补记和纠正书面历史记载舛误的功能。

晋城位于太行山中,特殊的自然条件,成就了晋城碑刻的蔚为大观。千百年来,虽历经沧桑巨变,风雨侵蚀,人为破坏,碑刻在不断地产生与毁灭着,但晋城的碑刻,仍旧有许多被保存下来,且灵光不减。从晋城现存的碑刻来看,时间之早、数量之多、内容之繁杂,可以说是惊人的。所以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自己所著的《语石》一书中总结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这里的“泽”就是今天的晋城。从晋城编纂《三晋石刻大全》的工作实践来看,这个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是可信的,是言之有据的。

编纂《三晋石刻大全》是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所做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大事、好事。根据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意见,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对此项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最终形成了以市、县两级宣传部为领导,以各县文博工作者为骨干,由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为指导的工作体系。编纂工作从2007年4月开始,到2010年初,历时两年多,已圆满完成,全市四县、一市、一区共分为6卷。这些石刻碑记总体可分为记事、记人、记文三大类,其中以记事者为最多。记人者多为墓志、墓表,也有数量不多的事迹、遗迹记;记文者则多为诗词游记,也有一些经幢、牒文、飭令等。

在载入晋城《三晋石刻大全》众多的碑刻中,历史纪年最早的是一块三国曹魏时期的记事碑。这是一块名不见经传的早期石刻,发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山里泉水电站建设时期。石刻现存于水电站机房北面的石崖上,距河谷地面数十米。石刻摩崖而作,书刻面积高80、宽60厘米,文字隶体竖书,共9行95个字。内容为:“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督治道郎中上党司徒悌、监作吏司徒从掾位下曲阳吴放督将师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道作遍桥阁,凿开石门一所。高一丈八尺,广九尺,长二丈。都匠木工司马陈留成有,当部匠军司马河东魏通,开石门师河内司马羌。”经考证,这块镌刻于公元244年的石刻,记载的是一次政府组织的筑路行动。通过石刻内容,可以得知曹魏时期,政府对于山区的道路修筑是十分重视的,有专门的机构、专业的工匠和大规模的建造活动。同时还可以得知当年在太行与河内的崇山峻岭中还隐藏着另外一条以栈道为主的重要通道。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发现将成为太行山交通史改写的重要依据。这是历史典籍中所没有的重要资料。

在载入晋城《三晋石刻大全》的碑刻中,还有一些关于炎帝的碑刻。其中有通过遗址发掘发现的碑刻,也有来自墓志中的点滴记载。2003年在高平羊头山五谷畦发现的一块镌刻于北齐天保二年(551)的碑刻,在碑额上就镌刻有“羊头山”的字样。碑文中也有“神农”、“山号羊头”的记录。而另一块镌刻于唐天授二年(691)、发现于高平清化寺遗址中的碑刻,其碑名即为《泽州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从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此山炎帝之所居也”的记载。碑中还系统地记叙了关于炎帝的传说故事。另外,还收集到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几方墓志,尽管记载内容不同,镌刻时间不同,但墓志中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从唐天祐到五代晋天福,一直延续于宋元符时期,羊头山南麓的这片土地都被称作“神农乡”。凡此种种,都印证了一段历史或传说,它们是记载高平羊头山炎帝文化的重要史料。

在这次编纂《三晋石刻大全》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批关于基层社会组织、管理、活动的重要碑

刻。它们有的记载着家庭世系的关系与变迁,有的体现了家庭之间的管理理念,有的记录了不同区域的社会风俗与村规民约,还有的反映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村庄邻里间产生矛盾的过程,解决问题的办法,达成和解后的共识。这些碑刻记录无疑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百科全书。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些与商业贸易有关的碑刻。如郭峪村在清顺治十三年(1656)所立的《阳城额设商税银两碑》,碑中记载了当时全县商税银的总量和阳城四镇分摊的情况。碑文说:全县共缴商税银 230 两,其中润城缴 110 两、白巷缴 20 两、郭峪缴 40 两、县城缴 60 两。从碑刻中记载的商税银分摊情况,即可得知明清之际,阳城的商业贸易中心是集中在沁河流域的,润城、白巷、郭峪所摊银两占全县总额的 74%。这就告诉我们,当年这里的商业贸易起码占到了阳城全县商业贸易的 70% 以上。

石刻除了保存历史记录的文献功能,具有独到的史料价值外,还有其独特的传承雕刻、绘画、书法等美学价值的功能。

从这次收集整理石刻的情况来看,晋城市众多的石刻除大量以文字内容为主的碑碣、摩崖、墓志、题记等之外,石窟造像、造像碑、陵墓石雕、民居石刻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石刻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作为雕刻艺术,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高平《羊头山石窟》,它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后历经北齐、隋唐,各代屡有建造,风格也依历史演进而不断嬗变,对研究古代雕塑艺术史的发展有很高的价值;又如高平《祁坟坟石雕碑柱》,精细华美,为清代艺术典型风格。

而刻画艺术品则再现了晋城地方艺术的成就,显示了工匠卓越的雕工技能。这些刻画艺术品,总体呈现雄浑朴实,稚拙灵活的艺术特点。如高平《北齐四面造像碑》融绘画与书法为一体,用浮雕、阴阳线刻等刀法展示了雕刻者高超的技艺。又如高平《西李门二仙庙金代伎乐线刻队戏图》,不仅对研究古代戏剧有重要价值,仅其流畅的线条,传神的形象,就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还有《苗匠神庙柱墩人物画像》、沁河沿岸民居古堡内的众多石刻装饰,多以神话、历史故事为题材,构图简洁,线条流畅,人物形神兼备,都充分体现了当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人们生活及美好追求的深刻影响,皆为石刻珍品。

晋城石刻体现的书法艺术魅力,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帝王、将相题书的石碑。如清康熙帝为阳城县皇城村所题“午亭山村”及“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对联;王国光、张慎言、陈廷敬等留下的墨迹石刻,包括皇城相府诸碑、青莲寺诗抄碑、真泽二仙庙诗抄碑以及阳城博物馆馆藏碑等。这些碑刻大多以帝王之尊、庙堂之气、书风严谨为特点,以楷、行书体为主。

第二类,为文人雅士、书法名家题写的碑石。金代元好问诗书俱佳,其七言绝句诗碑现存陵川县西溪二仙庙,书法结体端庄,字字内敛,用笔劲挺利落,体势神采飞动,有晋人楷书之风范;乌政管神庙碑以集赵孟頫书体为能事,可见书风盛行,无处不在;书法名家董其昌、文徵明、王铎等文墨刻石流传泽州,为后人临摹学习提供范本,多以草书留世;阳城博物馆馆藏董其昌论诗碑,其书法清朗洒脱,秀逸空灵,富于天然之趣;沁水柳氏民居文徵明书家训四则碑,其书法劲健奔放,姿媚道劲,风骨烂漫;阳城博物馆馆藏王铎七言绝句诗碑,其书法力反传统之柔媚积习,标榜风力气骨,章法错综参差,纵横跌宕。

第三类,为地方达人书写的碑刻。晋城现存碑刻中以北朝、唐墓志最为精美。如高平《魏故襄威将军积射将军郭君墓志铭》属北朝刻石,文字讲究法度,体态多姿,方劲见诸圆厚,文气多于野趣。市博物馆现存大唐初、中、晚期墓志铭数十方。因唐代国强民殷,疆域广大,文化气度恢弘,博大壮丽,又承接东晋尺牍、北魏墓志之风,楷法兴盛。如《唐故周居士墓志》、《唐故璩君墓志》、《唐故张府君墓志》、《唐故李君墓志》、《唐故居士张府君墓志》、《大唐故君夫人上官氏墓志》、《大唐故陪戎副尉张君墓志》等。其章法布局或松或紧,笔体或楷或草,笔法或方或圆,刀法纯熟,意味深长。金以后,特别是明清碑多以唐楷入帖,形成“馆阁体”,失去了书写的率真。随着时代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达,书法日益脱离其实用性,向纯艺术发展,成为少数人津津乐道的雅事,碑刻实用价值受到影响。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晋城建市以后,虽也有不少文人墨客书刻于石,但多浮躁、无章法,好者寥寥。更有甚者,以电脑刻字作为书写文体,缺少了书法的

艺术价值。

新编的《三晋石刻大全》，其最大的特点是在年代上占了优势，以定稿为下限，这就意味着我们收入的内容是非常全面的。不但涵盖了中华民国时期，还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7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从我们所收录的碑刻，即可了解到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我们中华民族越过了重重的艰难险阻，推翻了帝制、驱逐了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中国。从县议员、小学校长到民国县长，从抗日民主政府到党支部、村委会、人民政府，立碑的主体在碑刻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样，碑刻的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修补寺庙到创建学校、兴建老年活动中心，从官宦私家的墓碑到闾村共建的抗日烈士纪念碑、革命烈士纪念碑，从修桥补路到“村村通”工程、创凿深井、新农村建设、开发营造绿色生态旅游区。这一时期的碑刻，如同一部近现代史诗，阅读碑文就如同徜徉于历史的时空隧道，自然会感慨万千。

在晋城，《三晋石刻大全》的编撰工作虽然已接近尾声，但是关于古代碑刻的研究，应该说才刚刚开了个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认识的发展，古代碑刻还会赋予我们更多新的、更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

历史会彰显出我们工作的意义。抚案回首，我们十分欣慰，因为我们对历史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心血。是为序。

概述

立碑题铭,镌石纪事,以昭示后人,向为古今所重视。这些“立此存照”的石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对于我们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服务当代,有着重要意义。

泽州县地处山西东南部,为山西通向中州的要冲。全县总人口 52.6 万,总面积 2023 平方千米,辖 14 镇 3 乡,633 个行政村。这里左丹右沁,群峰拱翠,植被丰茂,风景秀美,是一处适宜人类生存的福地;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文化兴盛,又是一处发展潜力巨大的宝地。

泽州石刻遍布全县,存世在两千通以上,也就是说每平方千米的面积上就有一块石刻。这次初步普查,使得石刻近千通,尚有许多未收录者。所收石刻形制繁多,内容不一,品类纷呈,应有尽有。有历史事件记载碑、建筑修缮纪念碑、灾凶警示碑、律令示禁碑、圣谕圣旨碑、民俗风习碑、民间契约碑、教育科举碑、宗教记事碑、佛教造像碑、经文石刻碑、人物神道碑、名贤功德碑、烈士纪念碑,还有各种题名、题记、匾联、诗文、书法以及墓表、墓志铭等等。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宗教、民俗、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泽州、研究泽州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实物资料。

石刻是一个地区悠久历史的佐证。

泽州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高都、秦庄、北焦庄、和村等新石器遗址丰富的古文化内涵,使人们得知在新石器时代至商代 10000 至 4000 年前的漫长时期,众多的泽州先人,已从远古漂泊不定的狩猎、采集生活走向定居的以农业为基础兼以畜牧的定居生活。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神农播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夏桀居垂、商汤祷雨等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源远流长,彰显着中华文明的伟大魅力。年代久远的石刻碑碣虽然大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从现存的石刻中依稀可见古老的文明。泽州现存石刻虽然从时间上来说始于三国曹魏时期,但以纪事来讲可以上溯到石器时代,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及历史传说相映配套。浮山上不仅有旧石器人类遗址,天然溶洞女娲窟、伏羲洞,人工建筑的女娲宫,还留下“女娲氏炼石处”摩崖石刻。此石刻被史学家称为“举世无双”的有关女娲补天的古代石刻。散布全县各地的娲皇庙、娲皇殿以及依庙而立的相关碑刻,表明泽州女娲崇拜的兴盛。“夏桀居垂”是我国夏末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在高都垂棘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夏文化遗址,高都玉皇庙碑刻中也有夏桀的记载。“商汤祷雨”流传甚广,泽州建有不少汤王庙,并留有一批相关的石刻,形成了独特的商汤文化。

石刻是一个地区文化兴盛的见证。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泽州积淀的文化底蕴相当深厚。军事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都非常丰富。

军事文化,是由泽州的战略位置所形成的。泽之一隅,关系甚大,向有洛汭咽喉、幽并屏障、河东藩篱之称,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在此发生的战事数不胜数。今漫游泽州各地,古战场、古驿道、古关隘、古寨堡、古桥梁……战争遗迹比比皆是,仅太行陞上的晋庙铺镇,古代就有 13 处关隘,正如该镇《增修太行碗子城记》碑中所言地势之利:“进则凌厉中原,退亦屏蔽全晋。”太行陞、羊肠阪、天井关、碗子城、巴公原……演绎过无数轰轰烈烈的历史活剧。现存碑刻中不乏记载。五代巴公原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场著名战事,关系到后周的生死存亡。地处巴公原的官庄村,有一通记事碑,就讲到该村于巴公原之战时为“契丹政事令杨衮铁骑兵”所驻之地。宋初赵匡胤平李筠,也是我国历史上一场著名战事。晋庙铺《增修太行碗子城记》中就提到赵匡胤“于马上亲负石,以平太行之险,乃败筠于泽州南”。明末陕北农民军转战山西,泽州成为重要战场。周村《补修城垣碑记》回忆昔日农民军“王嘉印、紫金梁等三十余头目”途经此地时的情况。

宗教文化,是泽州地区的一大特色。泽州古代三里一寺,五里一庙,几乎村村有寺,村村有庙,现在仍保留了一大批寺庙,可见旧时宗教之兴盛。泽州现存石刻亦以宗教为多。从北魏始,历朝历代皆有。北朝石刻,有北魏时期的《崇寿寺造像碑》,有北齐武平元年(570)《北齐造像碑》等。唐、宋遗碑甚众,并且不乏珍品。以青莲寺为例,唐宝历元年(825)所立《硖石寺慧远法师遗迹记》,碑首线刻弥勒讲经的情况。因为当时弥勒尚未成佛,所以服装仍是印度在家人(菩萨)的装束。近年发现的北齐龙华造像石,为国内外现存最早的密教文物。佛教石刻中还涉及到一批我国著名的大德高僧,如“佛门异才”昙始、“僧中之龙”慧远、李唐王子惠愔、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不空金刚、“唐之贵叶”神墨、释义大家智通、弘法大师智岑、“太常寺卿”紫羽、金代高僧福裕、工于音律的洪源、宝寂等。道教石刻中涉及到全真教的邱处机、尹清和、于洞真、宋披云、杜德阳、王志省、通微子等著名人物。这些碑刻是研究我国宗教史的珍贵史料。

建筑文化,是泽州地区的一大亮点。泽州为山西的文物大县,古寺庙、古桥梁、古民居等建筑文物比比皆是,仅寺庙观堂就有839处,堪为“古建博物馆”。现存碑碣多依建筑物而立,是建筑文化的体现。石刻多记载建筑物的修建起因、过程、材料、时间、功德主、工匠、维首等情况,为专业人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青莲寺唐碑《硖石寺慧远法师遗迹记》,以线刻形式图示唐代寺院全貌,山门、围廊、佛殿、讲坛莫不具备,图中所绘唐代组群建筑具有以楼阁式建筑为主体进行布局的时代特征。它是研究唐代建筑布局和形制的形象资料,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关注。山里泉三国曹魏正始五年(244)镌刻石壁碑,是泽州最早的石刻,距今一千七百多年。该碑翔实记载了三国曹魏时期,上党交通官率工程兵千余人,兴建从山西通往河南曲阳(今济源市西)的一条通道。碑文所记“高一丈八尺,广九尺,长二丈”的“石门”,是三晋有史以来修建最早的隧道,比汉明帝永平六年(63)建成的七盘山隧道高出0.74米。该石刻对研究我国古代交通建设弥足珍贵。

石刻是一个地区经济状况的铁证。

传统手工业文化,是泽州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其中制铁业最为著名。泽州铁货日进斗金,红极一时,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冶铸基地。鸦片战争前,“是有几亿的人从凤台县(晋城)取得铁的供应的”(李希霍芬《书信集》)。被誉为“九州针都”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阳,曾是我国最大的制针基地。正如李希霍芬在《书信集》中所说:“大阳的针供应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远销中亚一带。”旧时大阳分为东镇针行与西镇针行,西镇《西针翁庙补修碑》中记载当时西镇的针铺有:“本镇三十九、上村十、中村五、下村九、南庄八、河东三、湾里三、史村一、张庄一、赵庄一”。可见昔日针业之兴盛。以南村镇为中心生产的锅鼎,唐代时即为名品,明清时行销全国,还曾销往欧洲、南亚、东南亚等地,“极获欧洲行家们的赞誉”。该镇冶底村即以冶铸兴盛而名,南马匠村重建玉皇庙碑就讲“南村居民多以熔铸起家”。除铁业之外,丝绸、珐华、皮金、油衣、线香、麻绳、饴糖、砂器、吕砚、松烟墨、桑皮纸以及近代玻璃等产品,都是一时地方名产。以手工业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泽州商人,是晋商队伍的生力军。黄头村移风寺元至治二年(1322)《创建三灵侯庙记》载:“水东管里社曰黄头,聚落百家,务本之余,多从商贾,优游丰备。”表明元代时泽州经商者已经很多。长河一带历来为工商业重镇。从周村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碑碣记载看,有店铺、商号七百余家,仅清乾隆五十五年《“万善同归”碑》中记载的商业字号就有百余家。跨越明清两代的“楸木山庄”王氏家族,到清时“富甲山右”。史料记载,“查其家产,现银一千七百万有奇”,可谓富可敌国。从“楸木山庄”所在的楸木洼、南庄现存碑刻以及珏山筑路碑等石刻中,也可看出王氏家族实力。

石刻是当地科第、人才的明证,同时又成为解决历史疑案的重要物证。

在这人杰地灵之地,涌现过许多著名人物。如乡贤祠中第一人的名相蔺相如、释义高祖慧远、三晋异才刘羲叟、戏曲之父孔三传、金代状元李俊民、抗金义士梁兴、“鬼才”王翼、明初“荅臣”茹太素、镇边大将侯璉、“山右第一才子”郭象升、近代画家原石民……北宋诗人黄廉以“河东人物气劲豪,泽州学者如牛毛”来赞誉这里的人才济济。在泽州石刻中,对当地的文风也不乏记载。如周村明隆庆四年(1570)《泽州周村镇重修庙祀记》中就有“人文熙洽,科第相望”,“泽士之杰且多”之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石刻中透露出来的一些重要信息弥补了史书之不足。如莒山蔺相如墓碑,乃晋城县令“奉旨重修”;青莲寺一些碑刻中都提到隋代我国六大高僧之首的慧远法师,乃本地“高都霍秀人”;高都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

修城隍庙记》为“诗巧”马旷所撰,对进一步了解这位传奇诗人颇有意义;抗金义士梁兴的籍贯素无准确记载,而在《泽州周村镇重修庙祀记》中提到了梁兴:“……岳武穆义旗北指,镇之梁兴筑砦响应。”明确梁兴就是周村镇人。石刻中还涉及到一些外地历史名人。如唐代诗人皇甫曙碧落山石佛寺碣,拦车村的韩愈诗碑、于谦诗碑等。元刻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五召李俊民令旨。蒙古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年间,以一个地跨欧亚两洲大国君主的身分,不惜降贵迁尊,向一个前朝状元——李俊民,不厌其烦地五次求材问计,连下五道召令,又特令怀孟州官刘海、泽州长官段直“以时奉贍,勿忘敬礼”。以帝王之尊,礼贤下士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鲜有。这样内容的石刻幸留泽州,实在是至贵至宝。

石刻是一个地区艺术水准的印证。

碑碣是文章、书法、镌刻三者结合的综合艺术。泽州石刻中,其文章不乏大手笔,遨游其中,其趣盎然,其乐无穷;其书法正、行、草、隶、篆等书体皆备,或灵秀妩媚,或刚健豪放;其镌刻装饰风格各异、生动多姿,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各种技法均有,给人美的享受。碧落寺摩崖碑,堪称绝世珍品。碑文保留古文字 120 余个。这些字有的源于殷商甲骨,有的源于周朝钟鼎,有的出自秦刻石鼓文或《泰山刻石》、《琅玕台刻石》、《峰山刻石》、《会稽刻石》等。此碑还使用了 30 多个用得奇巧的假借字。碑中多次出现一个字的多种写法。例如“真”、“玄”二字,写法不下 5 种;“之”字写法多达 7 种。且每字写法有源有据,绝非臆造。这又增加了此碑的工艺价值。用小篆笔法书写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在中国书法史上属于首创,对后人影响很大,唐代大书法家李阳冰、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北宋著名天文历法家刘义叟等都倍加推崇。

洋洋大观的泽州石刻,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保护、整理、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虽已结稿,但仍有大批石刻未有收录,尚需继续努力做下去,以延续历史文化。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卷》编委会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	吴广隆
概述	编委会

上编 现存石刻

●三国·北朝·唐

山里泉摩崖题刻(魏正始五年)	(五)
崇寿寺造像碑(北魏)	(六)
北齐造像碑(北齐武平元年)	(七)
普觉寺唐碑(唐天宝元年)	(八)
崇寿寺经幢(唐天宝七年至十五年)	(九)
赵才墓志铭(唐上元元年)	(一〇)
弥勒菩萨上生变赞并序(唐宝历元年)	(一一)
硖石寺慧远法师遗迹记(唐宝历元年)	(一二)
青莲寺古德高僧记(唐大和七年)	(一三)
碧落寺皇甫曙诗二首(唐开成元年)	(一四)
佛顶尊胜陀尼经幢赞并序(唐开成四年)	(一五)
青莲寺碑碣之所记(唐乾符四年)	(一六)
慧峰和尚塔记(唐乾宁二年)	(一六)
古佛龕摩崖记(唐天复元年)	(一七)
杨郡君夫人摩崖诗刻(唐天祐十三年)	(一七)
青莲寺碑碣之所记(唐代)	(一八)
硖石山青莲寺上方院铭记并序(唐代)	(一九)
崇寿寺造像碑(唐代)	(二〇)

●宋·金

北宋记税碑(北宋开宝八年)	(二三)
青莲寺上院赐额“福严之院”牒(北宋太平兴国三年)	(二四)
泽州硖石山青莲寺新修弥勒佛殿记(北宋景德四年)	(二五)
庾能社闾社建立佛堂碑(北宋祥符七年)	(二六)
崇寿寺宋碑(北宋天圣十年)	(二七)
北宋门枕石题记(北宋至和元年)	(二八)
大宋国泽州高都城县移风乡招贤馆纠维长老重兴二仙行宫记(北宋嘉祐四年)	(二九)

玉皇庙碑文(北宋熙宁九年)	(三二)
冶底岱庙宋元丰三年石刻题记(一)(北宋元丰三年)	(三三)
冶底岱庙宋元丰三年石刻题记(二)(北宋元丰三年)	(三四)
福岩院晏知止题名(北宋元丰八年)	(三五)
景德寺石柱题记(北宋元祐二年)	(三六)
青莲寺石柱题名记(北宋元祐四年)	(三七)
青莲寺段约石柱题名记(北宋元符元年)	(三七)
泽州牒准硃石山青莲寺僧玄依大师署状立本寺常住地土记(北宋元符二年)	(三八)
小南村二仙庙后殿东石柱题记(北宋建中靖国元年)	(三九)
青莲寺崇宁元年石柱题名记(北宋崇宁元年)	(四〇)
福严净影山场之记(北宋崇宁四年)	(四〇)
二仙铭记(北宋崇宁五年)	(四一)
二仙庙记(北宋大观元年)	(四二)
北义城玉皇庙石柱题记(北宋大观四年)	(四三)
醯盆题记(北宋政和元年)	(四四)
新修二仙庙记(北宋政和七年)	(四五)
崇寿寺石柱题记(北宋宣和元年)	(四七)
重修汤王殿宇记(北宋宣和元年)	(四八)
泽州晋城县建兴乡七擗管重修汤王庙记(北宋宣和二年)	(四九)
陈竹蓐等石柱题记(北宋宣和四年)	(五〇)
顿村济渎庙石柱题记(北宋宣和四年)	(五〇)
碧落寺摩崖刻文(北宋宣和五年)	(五一)
陈子镇等石柱题记(北宋宣和七年)	(五二)
崇寿寺新修三门记(金天会八年)	(五三)
崇寿寺门楣题记(金天会八年)	(五四)
峡石山福严禅院故副住持潮公和尚塔铭(金皇统元年)	(五五)
普觉寺敕牒(金大定三年)	(五六)
硃石山福严院重修佛殿记(金大定四年)	(五七)
硃石山福严院创建钟楼台基记(金大定七年)	(五九)
掷笔台题名记(金大定十八年)	(六〇)
高都东岳庙石柱题记(金大定十八年)	(六一)
掷笔台题名又记(金大定十九年)	(六一)
岱岳庙石柱题记(金大定二十年)	(六二)
福严禅院重修水堂记(金大定二十四年)	(六三)
高都东岳庙门楣题记(金大定二十五年)	(六三)
冶底岱庙石柱题记(金大定二十七年)	(六四)
新修济渎庙记(金大定二十九年)	(六五)
尹西玉皇庙石柱题记(金明昌五年)	(六六)
福严院许安仁诗碑(金明昌六年)	(六七)
福严院西院许安仁诗碑(金明昌六年)	(六七)
高都玉皇庙石柱题记(金承安四年)	(六八)
青莲寺许古石柱题名记(金承安五年)	(六九)